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 张全景



我与杨贵同志相识、相知多年，他始终是我敬重和学习的榜样，在他的忌日来临之际，闻知他的骨灰归葬林州，无限感慨涌上心头，遂写此文寄以深切的缅怀。

红旗渠的建设，从计划的提出到勘察、设计、施工，时任县委书记杨贵是最直接的领导者、组织者，人们称他是建设红旗渠的“旗手”。毛泽东曾经称赞他“治水很有一套”。当地群众说，“南有都江堰，北有红旗渠；古有李冰，今有杨贵”。这充分说明了杨贵在红旗渠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杨贵是一位好同志、好党员，始终忠诚于党，热爱群众，心中无我。他从15岁入党的那一天起，就抱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决心，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英勇战斗，出生入死，取得了很多惊人的战绩。1954年，他到林县担任县委书记后，面对当地严重缺水、小旱薄产、大旱绝产的严酷自然条件，下定决心带领群众铲掉导致生活困难的“病根子”。他提出了“水字当头、全面发展”的方针，积极发动群众建起一批水利工程，缓解了缺水的问题。然而1959年发生的特大旱灾，使杨贵认识到，不能靠天赐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找到稳定的水源才行。在广泛深入的调研基础上，他大胆提出了从临近的山西省平顺县内的浊漳河引水的方案。然而，要完成这一工程，需要修建1520多公里的各种水渠，削平1250个山头，打通200多个隧道，挖土石方1800多万立方米。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以杨贵为代表的县委下定决心，“与其苦熬不如苦干”“早干早受益，晚干多受苦”，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这一代人吃再大的苦也要干。十年间，全县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团结协作，艰苦奋斗，凭借自身的智慧和不屈的精神，谱写了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凯歌，创造了罕见的人间奇迹。当杨贵调离林县时，自发为他送行的群众排成了长龙，每人端着一碗清水，一片感谢、赞扬声，有的泣不成声，苦苦挽留，有的打出横幅“太行一渠清水，杨贵一身正气”。在建渠的十年中，没有发生一次请客送礼，没有一处挥霍浪费，没有一例贪污受贿，没

有任何一个人挪用建筑物资，建渠质量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考验，多么令人赞叹！

杨贵始终牢记使命，注重县党委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把每位班子成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他以身作则，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议事、共同解决难题。注重调动和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党员干部正确认识修建红旗渠的重大意义，自觉成为宣传员、工作员、战斗员。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他们吃苦在前，艰巨任务在前，危险在前。建渠过程中涌现出很多党员先锋队、铁姑娘队、青年突击队等战斗团队；涌现出任羊成、吴祖太、王师存、常根虎、李改云、郭秋英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极大地鼓舞和带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十年间，参加建设的民工约30万人。红旗渠的建成使林县人民直接感受到了什么是获得感和幸福感，从杨贵等一大批党员干部身上看到：只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能干成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

杨贵不仅敢于担当，而且还善于担当，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按科学规律办事。他在调研水源地过程中发现，地处深山区的桑耳庄和马家山劈山修渠解决了人畜用水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修建的爱民渠，解决了几个村用水问题。在许多典型经验的启发下，他初步形成了“引漳入林”的思路。但当提出这个设想时，遇到了不小的阻力，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有人怀疑动摇，有人坚决反对。有人提出：“渠通了，水流不过来怎么办？”杨贵的回答是：“如果是那样的结果，我就从太行山上跳下去，向全县人民谢罪！”他坚决的态度鼓舞了大家，绝大多数人认识到“引漳入林”是一个关系林县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符合群众的长远利益。最终，县委采纳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下定决心，无论困难有多大，也要把水渠建起来。红旗渠开工不久就遇到了麻烦。战线太长，力量分散，3万多人分散在70多公里的主干渠上，各自为战，工效很低。杨贵随即与民工、技术人员座谈，听取意见，及时调整了原定施工方案，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先修建山西境内20公里长的渠道，这样不仅能尽快把漳河水引入林县境内，同时还可以减轻山西人民的负担。作出这样的调整后，只用3个多月就把20公里渠道建好了，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好事做好并不容易，但杨贵始终有利于人民群众、有利

于党的事业出发，以科学的态度来面对，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任何一项事业，其成就都是与艰难成正比的。很多伟大的成就都是在看似不具备条件、不可能实现时创造出来的。红旗渠开工时，新中国成立只有十年，科学技术落后，没有现代化施工手段，缺少专业人才和相应的技术支撑，而且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面对这样一个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宏大工程，困难可想而知。毛泽东说过：“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红旗渠就是精神变物质的有力证明。有了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条件再艰苦也能创造出奇迹，“两弹一星”、大庆油田等都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才完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品质，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基，也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的根基。无论现在、将来条件有了怎样的改善，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都不过时，永远都不能丢，这是支撑中华民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脊梁。

杨贵从26岁到林县工作开始，他的一生便与林县这片土地难以分离，他的感情跟这里的人民群众难以割舍。当地群众把杨贵当作亲人一般，每次闻听他回到林州，山里的乡亲们纷纷提着鸡蛋，带着手工纳的鞋垫一起去看望。杨贵还清楚地记得他们中许多人的名字，与林州老百姓朴实真挚的感情多年未变。“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他去世后，林州市委和当地群众以各种方式寄托哀思，缅怀他的功绩。入党为什么？当官做什么？身后留什么？这是每名党员干部都应很好思考的问题，杨贵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魂兮归来！杨贵去世一周年后，他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公墓回到了林州，回到他魂牵梦绕、撒播过青春与汗水的热土，实现了他的心愿。没有任何官方仪式，没有新闻媒体报道，甚至没有惊动任何一个人，这正是他的风范，“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是的，斯人已逝，但杨贵同志的精神已化作了这巍峨的太行山脉，融入到了这一渠清水，泽被后世，千古流芳！

（摘自2019年第9期《中华魂》，原标题为《勇于担当的县委书记——深切缅怀杨贵同志》）

王邦玉，四川省万源县人，1920年2月生，1933年9月参加工农红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2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县委书记，1956年4月任奇台县委书记，1965年7月任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副州长、州党委常委，1979年4月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党组书记，1983年任自治区顾问委员会委员，1987年12月离休。



《阜康地方志》显示，阜康县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是王邦玉。通过网络信息我们得知，王老可能是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党组书记的岗位上离休。联系自治区气象局离退休干部办公室，我们得到一个惊喜：91岁的王邦玉仍健在！离退休干部办公室主任谢林给了我们王老的电话。

拨通电话，王邦玉的老伴向阿姨很是热情，她帮我们约定了见面时间。

如约来到王老家，听到脚步声，王老和向阿姨已经开门等我们了。家里只有王老和向阿姨，茶几上摆着瓜子和糖，房间里家具不多，电视是老款的。沙发的一侧是书架，书籍、报纸摆放得很整齐，客厅的阳台上摆满了绿色植物。王老个子不高、很瘦，双耳戴着助听器（耳朵在抗日战争时被日本投下的炸弹震坏了），但精神很好，而且思维活跃。他的讲述把我们带到了那个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年代。

“县太爷”的婚礼，让人认识了共产党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王老随王震将军的部队进驻新疆。1950年2月，他被任命为阜康县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说到这里，记者想起阜康地方志里《县委书记的婚礼》那篇文章，便问正忙着为我们倒茶水的向阿姨：“您跟王老是怎么认识的，是自由恋爱吗？”向阿姨笑着说：“那个年代都那么忙，哪有自由恋爱呀，我们能走到一起，就跟电视剧《亮剑》里演的一样，都是组织安排的呀！”王老很幽默地说：“那你也没嫁错人啊！”

说着，老两口似乎都沉浸在那个简单而幸福的婚礼中。王老说：“我和文秀结婚那可是阜康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的婚礼。当时，人民政府成立不久，老百姓对共产党并不十分了解，他们见惯了国民党的县太爷平日里的威风气势，都想见识一下我这个共产党的‘县太爷’在结婚这一人生重大事情上的宏大排场。但是等啊，盼啊，既不见我们发请帖，也不见张罗置办，都十分纳闷，这更增加了人们的好奇心理。其实，那时的我工作非常忙，人民政权刚刚建立，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根本没时间顾及自己的婚事。”

王老说：“为了不耽误工作，我们抽了个休息日把婚事办了。我记得当时我穿着洗得有点发白的旧军装，带着几个机关干部去娶亲了，当天文秀穿得也很普通，我和文秀并肩走在街上，机关的干部阿雄挎着个旧式手风琴，欢天喜地地奏着欢快的曲子。人们望着这从未见过的迎亲方式，猛然醒悟过来，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了，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再也不是当官做老爷的‘县太爷’了。我们的新房就设在我办公室的套间里，除了几张办公室的桌凳和一张旧木板床外，没有添置任何新家具。对前来祝贺的人们，我们用茶水、喜糖相待。这欢

乐、简朴的婚礼使人们对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干部有了新的认识。”

在阜康工作期间，王老他们顺利完成了党政建设以及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和维护社会稳定、巩固祖国边防等各项重大任务。

过草地险丢命，至今怀念救命恩人

1920年，王邦玉出生在四川省万源县茶阳坡一个贫农家里，当时家里四口人，和广大劳苦大众一样，受地主、土豪、军阀的剥削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1933年9月，徐向前率领一支工农红军解放了他的家乡。当时只有13岁的他，也同农村其他的青年一样，踊跃报名参加了工农红军，并分配在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一团当战士，他是全团年龄最小的一个。

“长征中，三次过草地。我遇到最困难、最危险的是1935年那次。”王老说，过草地时断了粮，连野菜、草根都吃光了。

当时又饿又累，加上脚上长了个疮，感染后不停地流血脓，还发高烧，昏倒过几次，慢慢地掉了队。幸运的是，后面的收容队赶来救了他。

九十一师政治部的一位指导员，把他仅有的一块馍馍给了王老，并搀扶着他一起走出了草地。“如果没有那位指导员援助的双手和那块救了我命的馍馍，也许我早就不在人世了。那位好心救我的指导员叫什么名字，我至今都不知道。回头想想，当时15岁的我，也太粗心了，连救命恩人的名字都记不得。”

就在1935年川西南解放雅安的战斗中，王老虽然负了伤，但硬是忍着伤痛英勇拼杀，还抓了3个俘虏，缴获了3支步枪和300多发子弹。1938年由团政治处刘绪光介绍，王邦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任命为独立三十三团特务连副指导员，接着在太行山抗大六分校学习1年。

活到老，学到老，先进性保持到老

1983年，王邦玉退居二线，1987年离休。离休后的王老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刻刻发挥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谢林说，多年来王老一直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在党的各项学习活动中，他认真学习，带头发言；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和建军80周年的座谈会上，他都事先准备了发言稿，声音洪亮、铿锵有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县（现阜康市）第一任县委书记——王邦玉

思想永远不退休

地第一个发言，充分体现了一名老党员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高风亮节，多次被新疆气象局机关党委评为优秀党员。

王老时刻心系人民群众，关注社会公益活动。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他在第一时间就赶到机关老干部服务中心，当场捐款1000元。在他的爱心行动带领下，其他老同志也纷纷捐款救助灾区。王老离休后订阅了六种报纸，看书读报、收看电视新闻是他每天的必修课。他常说，“要活到老，学到老，与时俱进，思想常新”。

谢林说，王老有一个让邻里羡慕的幸福家庭。他认为家庭和睦、子孙成才，就是为社会进步、国家发展作贡献。因此，他鼓励孩子们到基层工作，帮助子女教育第三代。在他的教诲下，孩子们都在各自岗位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慈祥、朴实、平易近人，与邻里、同事之间相处和睦，每天清晨人们总能看到他提着篮子去菜市场，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红军老寿星”。

王邦玉从长征一路走到现在，也把长征精神弘扬到现在，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优良品德和奋斗进取精神激励着我们每一个后来者。

（摘自2011年6月27日《中国县域经济报》，作者为查燕荣）



探寻“天下第一山”

□ 赖永峰 刘兴

毛泽东为何选择来到井冈山，为什么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斗争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又是什么？回到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

五百里井冈，山山相连、峰峦叠嶂，如一条璀璨的玉带，缠绕在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沿着蜿蜒山路，一路翻山越岭，来到了山沟沟里的井冈山茨坪镇，这里是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所在地，也曾是革命根据地内党政军的最高指挥中心所在地。

“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源起的‘山沟’，就是井冈山，就是湘赣边界的广大山区乡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其艰难开拓，始于井冈山。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讲解员尹龙乔丹脚步轻快，引着记者走进展馆，指着朱德亲笔题

字“天下第一山”自豪地介绍。为什么是井冈山？得从毛泽东的“上山”思想说起。1927年6月，毛泽东在武昌都府堤召集湖南同志开会时，号召大家“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第一次提出了“上山”思想；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井冈山博物馆编研陈列室副主任周见美说，毛泽东“上山”思想的实质，就是将革命工作的重心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的农村或山区去。这为后来“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摘自2021年1月5日《经济日报》，原标题为《井冈山上党旗红》）

从韶山冲走出来的『红色管家』

□ 刘颖

毛泽东，1896年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1921年随毛泽东投身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底，毛泽东赴江西安源从事工人运动。他深入矿井，向工人宣讲革命道理，创办夜校，带领工人同资本家作斗争，同时发挥理财专长，组织成立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并担任总经理，发行合作社股票，创新采购方式，受到工人的一致拥护。在毛泽东的苦心经营下，消费合作社成为中国共产党从事秘密活动、筹措经费、发行革命书刊、发展党的组织的重要场所。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毛泽东承担起“红色管家”的重任。1932年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时，只有会计、记账员、出纳、总务和行长毛泽东5人，小小的团队，却要管理中央苏区所有军民的日常供给、后勤粮草。为克服困难，毛泽东坚决贯彻“统一财政，筹款支援前线”的指示，发行苏区货币，统一苏区财政，发行建设公债，成立钨矿公司，有力支持了革命战争及根据地

的建设和发展。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国家银行被编入中央纵队十五大队，毛泽东任大队长兼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他坚持做思想政治工作，带头攻坚克难，真情关心战士。在毛泽东的以身作则下，十五大队解决了运输、打土豪、筹粮筹款、保障供给等艰巨任务，被称为“扁担上的国家银行”。

1938年2月，原定去苏联治病的毛泽东受党中央派遣，化名周彬，出任新疆省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职务。面对新疆财政的“烂摊子”，他采取调整税收、改革币制、平穩物价、发行建设公债、节支开源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促进了工农牧业及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拥护。1941年7月，毛泽东调任新疆民政厅厅长，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整顿救济院，帮助3000多名寡寡孤苦告别了沿街乞讨的悲惨命运，他们异口同声地称赞毛泽东：“周厅长，亚克西！”但是，毛泽东等人的出色工作，却招致了新疆军阀的不安与嫉恨。1942年9月17日，毛泽民

不幸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毛泽民坚贞不屈。敌人见始终无法从他口中得知任何有用信息，便恼羞成怒，于次年9月将他秘密杀害。

毛泽民常说：“我们是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作为党的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自1921年起，这位从韶山冲走出来的“红色管家”，就一直为党、为革命工作，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摘自2021年第3期《党建》，原标题为《毛泽民：从韶山冲走出来的“红色管家”》）

